

1991 · 5

3 4-40
贵州

社科

通讯



GUIZHOU SHEKE
TONGXUN

贵州社科通讯 目录

一九九一年第五期 (总第130期)

主编: 郭青

1991年10月

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纪念“双百”方针提出35周年
年……………郭青(1)

· 学习与思考 ·

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
区别……………谢三友(11)

正确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
……………李兴猛(13)

对党内思想斗争的几点认识……………
……………陈廷龙(16)

经济理论上的新突破
——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讲
话的一点体会……………韦慈竹(19)

· 经济研究 ·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
自我完善……………穆琨 冯地久(22)

经济体制改革对贵州产业结构调整
影响……………丁秀原(25)

· 社会福利 ·

做好集体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工作
……………杨见非(30)

· 财政信用 ·

搞好财政信用 促进县级经济发展
……………杨杰(32)

财政信用应大力支持科技兴农
……………孙光佑(34)

· 文化论坛 ·

社会文化市场管理浅议……………周圣德(36)

· 来稿摘登 ·

加强灾害经济学的研究
……………省计委 李启鑫(39)

人口素质与生育政策
……………织金县政协 郑明德
刘德丰 李德鹏(40)

加强农村集体服务工作
……………中共台江县委 吴昌明(40)

· 学会工作与学术动态 ·

省社科联召开理论座谈会
把握“七一”讲话精神 加强思
想理论建设……………成钟岗(42)

完善社会保险制度 做好劳动就业
工作
——西南地区劳动工作研讨会综
述……………戴儒端(44)

毕节地区农业经济学会联系实际开展
学术活动成效显著……………(46)

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学术
讨论会在筑举行……………(47)

省财政厅 省会计学会联合召开学术
报告会……………(48)

G02

2-3

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纪念“双百”方针提出35周年

郭青

35年前（1956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35年的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我们党和国家繁荣科学文化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它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今天，当我们在纪念“双百”方针提出35周年的时候，对“双百”方针提出的历史背景和贯彻执行中的曲折过程进行全面回顾，对进一步正确贯彻执行这一方针认真加以探索和思考，为开创我省和我国学术繁荣的新局面贡献力量，我认为是有裨益的。

（一）历史的回顾

回顾1956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定为我们党在科学文化工作中的一条基本方针，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一个基本的历史背景是，那一年春天我国“三大改造”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国家以和平赎买的方法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使我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这在世界上首开了用和平方法消灭资本主义的历史纪元。那时党和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在科学文化领域由于我们自己的某些“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由于受到苏联在学术批判中粗暴作风的影

响，存在着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障碍。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只许发展一种学派，不许发展另一种学派，在学术、文艺问题上动不动就打棍子、扣帽子。为了治理好社会主义的中国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在狠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对怎样正确领导科学文化工作，也提到党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当时党中央提出实行“双百”方针的决策，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报告的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是4月25日作的，4月2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中，完整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他说：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并说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5月2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各方人士发言之后，他在第二次讲话中正式宣布党中央制定并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他用形象比喻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刊物

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5月26日，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向知识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这个方针作了详尽、透彻的阐述。他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中央现在着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就是要我们在文花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也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而努力，为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①“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后来，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2月27日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双百”方针，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同时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注：以上讲话均见人民出版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243页至246页）^②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双百”方针，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繁荣科学文化的需要，在我国学术界和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的眼界开阔了，思想活泼起来了，一些错误的作法也得到了纠正。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我国遗传学界的变化。50年代初，我国全面贯彻学习苏联，把苏联的一些错误的东西也当作正确的照搬来了，在遗传学中就出现了树立以李森科为代表的米丘林

遗传学，批判并全盘否定国际上已经建立半个世纪的以孟德尔、摩尔根为代表的现代遗传学，对具有摩尔根学派观点的学者进行批判，并给戴上各种政治帽子，停止了摩尔根遗传学及其相关学科的讲授、实验和论文著作的出版。党中央“双百”方针提出后，为了纠正这种错误作法，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共同主持，于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我国遗传学及相关学科的两派学者都被邀请参加了座谈会，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打破了原先那种“一家独鸣”的局面，为贯彻“双百”方针开创了良好的先例。从1956年春天到1957年春天，我国的各个学术领域在“双百”方针的正确引导下，都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活跃局面。当时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如哲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新闻、出版等，不少学者开始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学术见解。广大科学工作者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调动起来了，为追求和坚持科学真理而独立思考，认真探索开拓。大家赞誉这一时期是科学的春天。但是，从1957年夏秋以后，我国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使“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和损害。1961年、1962年，党中央先后批发了科学、教育、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纠正违背“双百”方针的错误，并为贯彻执行这一方针规定一系列政策，使情况向好的方面变化。但是，1964年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又出现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运动，使这个方针又受到了干扰和损害。十年动乱更彻底践踏了“双百”方针，当初那种生动活泼的探索、争鸣局面再也没有出现。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根本上克服纠正了错误的指导思想 and 错误的作法，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上来，党的“双百”方针才得以

认真贯彻执行，学术领域有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从而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广大科学工作者称谓现在是科学的第二个春天。

35年曲折的历史告诉我们，当“双百”方针得到正确贯彻执行的时候，我国学术文化领域则枝叶茂盛，繁花似锦；当“双百”方针受到干扰和破坏的时候，学术文化领域则死气沉沉，毫无生机。所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及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反复重申，“双百”方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长期的基本方针。1979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强调指出：“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又指出：“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86年9月2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也明确指出：“必须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和鼓励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大大活跃起来，使各项决策建立在更加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之上。”党的十三大报告也强调指出：“必须在实际工作中鼓励探索和开拓，在理论研究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生活、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没有探索，没有创新，没有不同试验的比较和不同意见的讨论，我们的事业就没有生气。”1990年12月30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也强调指出：“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

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促进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繁荣和发展。”江泽民总书记在今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我们党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方针，我们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努力创造勇于探索和创新的活跃气氛，提倡不同学术观点、艺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同志式的批评和反批评”。由此可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党和国家如此强调毫不动摇的贯彻执行“双百”方针，说明它对繁荣发展我国科学文化事业是多么重要。这一方针同党的学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以及党在科学文化领域其它重要方针一起，是我国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繁荣进步的根本保证。在社会科学领域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能够促进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领导地位，有助于激励社会科学工作者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探索精神和创造活力，有助于社会科学工作者对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在充分讨论争鸣的基础上作出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结论，有助于建设一支富有创新精神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

（二）对贯彻“双百”方针的探索与思考

35年的曲折历程，使人深切体会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战胜了形形色色的干扰才得以前进和发展的。同时，也使人深深体会到，“双百”方针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的，是无产阶级繁荣科学文化的正确方针，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现在，总结贯

切“双百”方针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有哪些问题使我们认识的更清楚了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贯彻“双百”方针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阐述“双百”方针时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当然是无产阶级的方针，而不是资产阶级或其它阶级的方针；它是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为剥削阶级和少数人服务的。因此，毛泽东同志在那段话之后紧接着提出实行“双百”方针时判断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其中“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又概括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六条政治标准与四项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并行不悖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集中体现了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因此，我们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和前提。“双百”方针同我们党的其他方针一样，都是为人民的利益、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当然也不能例外。“双百”方针同四项基本原则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发展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从而保证科学文化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贯彻“双百”方

针的过程中，受到最大的干扰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在科学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内，以贯彻“双百”方针做掩护，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企图把人们引到邪路上去。如果说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之前，许多同志还看不清这一点，那么，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的言行和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要真正贯彻“双百”方针，而是为推行其用资本主义改造中国的政治主张服务。由此可见，在科学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内，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解决根本原则和方向问题，以便造成更有利于科学文化发展的安定团结的环境和民主和谐的气氛，更好地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同时，要注意把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和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的观点严格区别开来。前者是有特定含意的，即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和国际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唱的完全一致的调子，属于敌我性质的问题；后者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两者的基本思想和态度是不同的，是可以区分的。有的人可能发表过一两个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的错误观点，但他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对这些人的错误观点，只能通过说理和批评自我批评，争取他本人和与他类似情况的知识分子，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与此同时，我们要一如既往的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志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和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提出新见解。

第二、正确处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关系

关于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是否要分开，

能不能分开，在我国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多数同志主张把二者分开来为好，以免动不动就把不同的学术观点上纲上线，扣上政治帽子，这在过去“左”的指导思想下大家深受其害的。也可以防止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钻空子贩卖私货，因为这些人从来就是采取实用主义手法的，当形势对他们有利时就说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不能分开，当形势对他们不利时（如清除精神污染、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又一口咬定说他们所散布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是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这些人从来就没有认真进行过学术研究，对他们来说，不论是唱政治调子，还是唱学术调子，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从这些情况出发，把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严格加以划分，不要混同，是完全必要的，也是现实的。同时，从二者内涵界定关系来讲，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它们应当也是可以分开的。对于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来讲，至少大部分学术问题是不能等同于政治问题的。那么，什么是政治问题，什么是学术问题呢？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二者相比较，自然科学好划分一些，社会科学较难划分一些。一般来说，政治问题在不同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就我国来说，现阶段要不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有些是属于资产阶级自由化范畴的问题，如全盘西化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鼓吹多党制、私有制等，这些都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只能加以批判。而学术问题，则是指人们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研究过程中的不同见解和认识。社会科学的学术问题，本身是有阶级性的，因此有些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有密切关系。如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问题，新闻的党性与人民

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有无局限性等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如果出发点是正确的，是为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即使意见截然不同，甚至有些意见是错误的，也仍然是个学术问题。但是，如果对上述那些问题的讨论，出发点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民主，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在新闻上搞资产阶级导向，这就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明显的政治问题。

当前，要把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区分开，关键是要把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加以严格界定，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必须彻底进行批判，毫不手软。同时，只要不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政治上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都应该算作学术问题，都应该放在百家争鸣的范围之内。即使有些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或倾向不好、有一定错误观点的问题，但本身并不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因而还属于“百家争鸣”的范围。如前几年我国学术界有的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观点，就是属于这种情况。说它的倾向不好，是因为它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同马克思的成熟时期的著作对立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同人道主义完全等同，抹煞了马克思主义同人道主义在历史观点上的根本区别。但这种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倾向不太好的观点，由于它并没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仍然属于理论探讨的范围，应该用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对待，可以在学术理论刊物上争鸣。当然，在学术问题上，有许多是和政治关系不很密切的，有的则根本没有多大关系，如考古年代、文物鉴定、自然科学中的许多纯技术性的研究等，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有正确和错误之分，但和政治没有必然联系。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一定要过多地强调遵循某一种思想指导，或从什么立场、观点出

发。但作为研究者个人的世界观改造问题，还是应当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确立自己对世界、对自我的认识。那么，是不是政治问题就不能讨论呢？当然不是。按照“宣传工作有纪律，理论探索无禁区”的原则，政治领域的问题照样可以讨论，不过要特别注意树立正确的立场观点，不要脱离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前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你的学术观点有无价值，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还必须用真理标准加以检验。

第三、贯彻“双百”方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在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中，之所以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一切事业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彻“双百”方针当然不能例外。党中央制定“双百”方针，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文化，使之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因而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保证“双百”方针得以健康发展。同时，“双百”方针的基本点，是在学术上实行民主讨论，自由探索的原则，通过批评和反批评，发展正确的先进的科学真理，纠正和抛弃错误的、落后的、谬误的东西，从而达到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目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体系，它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有助于指出某一学术问题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有助于把学术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引向正确的轨道，率先达到真理的彼岸。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学术领域中必然具有指导作用和保证作用。而且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能够以自己理论的科学性和彻底性来说服人，来掌握群众，从而在总体超过其它意识形态，必然在争鸣中占主导

地位。这已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在百家争鸣中，既是指导思想，本身也必然在争鸣的实践中受到检验并得到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的，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行“双百”方针，不但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和指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还有一个如何正确看待百家争鸣中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问题。在学术讨论中出现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正常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一样，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带有自觉性，而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般是属于认识问题，还常常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没有意识到自己所持的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对争鸣中出现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用行政手段压服，只能在争鸣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去克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使之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对于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应予以坚决驳斥和批判，决不能让它自由泛滥。

贯彻“双百”方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原则，对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并且千方百计反对这样做，他们的理由是马克思主义是“百家”当中的

“一家”，不能让“一家”去指导“九十九家”。显然，这种说法的用意在于贬低和诋毁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在学术探索中的指导地位。为什么他们起劲地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呢？很明显，在百家争鸣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然会揭穿他们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阴谋，他们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黄粱美梦就会破产，这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作为百家争鸣指导思想的根本原因。事实上那些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表面上看起来道貌岸然，摆出一副学术权威的架势，其实他们从来没有认真搞过学术研究，更不是认真地贯彻“双百”方针，而是打着“双百”方针的旗号，贩卖其攻击社会主义的私货。“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已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了。

第四、发扬学术民主，保障学术自由

贯彻“双百”方针，必须发扬学术民主，为科学工作者提供自由探索的宽松环境和条件。这里所讲的学术民主，与政治民主的概念是有区别的，政治民主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而在学术探索中多数原则是不行的，是违背科学发展规律的。因为真理不是由多数决定的，而是由实践标准决定的。真理要靠长期的探索和积累逐步形成的，而且真理开始总是由少数人发现的。因此在学术探索中实行的学术民主，主要倡导学术理论界畅所欲言，众说纷纭，百家争鸣，允许和支持发展不同意见，尊重和维护不同意见，特别是少数学者的不同意见。这样的学术民主，无疑是创造宽松和谐的环境，有助于学者们探讨真理，并尽快达到真理的彼岸。

在科学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内，支持和提倡学术理论工作者自由探索和创新，这是科学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一个没有学

术自由的国家，科学必然是落后的。保障学术理论研究探索的自由，关系着国家科学事业能否发达，生产力能否尽快发展的大问题。因此，我国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其它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指出：“学术和艺术问题，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也明确指出：“要真正做到尊重科学技术人才，就必须保障学术上的自由探索、自由讨论，使人们无所畏惧地去追求真理。提倡各种学派在百家争鸣中多作建树，反对滥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自由。学术上的是非，只能通过自由讨论和实践的检验，求得正确的认识，决不要再搞过去那种强迫推行一种观点、压制不同观点自由讨论的所谓学术批判。只有这样，才能使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事业心和国家的要求完满地结合起来，使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智慧和创造精神得到充分发挥。”这些铿锵有声的宪法条律、决议箴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发扬学术民主、鼓励自由探索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科学性，是我们贯彻“双百”方针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学术自由是每一个科学工作者不可剥夺的权利，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保护。我们倡导学术自由的原则，就是让每个人充分行使追求真理、发现真理、阐述真理的权利，把一切不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东西统统逐出科学的殿堂。同时，倡导学术自由，也是尊重少数、保护少数的一项重要信条。因为科学不是一般的行为规范或准则，而是对无数实践的总结概括进而抽象升华为理论，并经受实践的检验。对一个科

学真理的探索发掘，在发现的初期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不被多数人所接受，甚至被指责为异端邪说，在这种情况下，学术自由的原则既保护了少数人的合法权利，保护了科学真理的开拓者，因而也有利于发展科学理论。科学理论的发展是旧内容的继承、充实、修改和扬弃，更是新内容的探索、创造和确立。理论探索呼唤着良好稳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呼唤着研究探索的自由。探索自由是理论发展的钥匙，是通向真理的桥梁。科学理论是人类思想文化中的一盏明灯。它能不断为人类驱除无知和迷信，改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智力水平，纯洁人的灵魂，使人的意识活动更加科学化，使人的实践更加符合事物内在发展的规律。理论研究工作肩负着光荣的史命。

从外部条件为理论探索者提供良好的自由探索的环境，并不等于会出成果，还需要探索者付出辛勤劳动，并要具备足够的理论勇气。因为在探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触动一些传统的旧思想、旧观念，因而引起种种议论和非难，遇到种种障碍和阻力，甚至要担风险，付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足够的理论勇气，没有冒风险、顶压力和必要时付出牺牲的精神，要在理论上开拓创新是难以想象的。何况一个真理、一个新见解的发现和提出，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和精力，需要进行反复探索和实践，而且在研究和探索过程中还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失误。这也需要理论探索者具备无私和无畏的理论勇气，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遇到责难不却步，发生挫折和失误不退缩，为探索追求真理百折不挠，为改革建设、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往无前。这里讲的探索者的理论勇气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源于丰富的理论素养，一往无前的探索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没有半点虚伪和怯懦的高尚情操。

第五、正确开展学术批评，正确对待探索中的失误

正确开展学术批评，是贯彻“双百”方针繁荣学术的一个重要条件。江泽民同志于1990年5月3日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文化领域里的是非，最终要靠实践来评判。要积极开展健康的充分说理的和富有建设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力戒用行政办法下结论。”所谓学术批评，就是用正确的方法、观点、理论，去匡正、评论有错误和偏颇的观点、方法和理论。学术批评决不是简单地否定某种东西，也不是抽象的概念之争，而是一项阐发真理、匡正谬误的严肃的学术工作。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和探索，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的。学术批评应当按照这一原则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评价研究成果，褒扬那些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和解决重大问题、为社会进步与发展作出了贡献的研究成果，批评各种违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无助于甚至有碍于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理论观点。“双百”方针是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正确方针，学术批评应当坚持贯彻并捍卫这一方针，对于妨碍“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乃至压制学术探索和学术批评的作法，应加以揭露和抨击。

学术批评，对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应当是平等的，就是说在学术领域批评者有批评、评论学术观点的权利，被批评者有反批评和进行论争的权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那种强迫推行一种观点、压制不同观点的所谓学术批判，声势浩大，铺天盖地，根本不允许被批者有阐述自己观点的申辩权利，那是极其错误的不足取的。已故的理论界老前辈孙冶方同志把这称之为“咄咄怪事”，并说：“资产阶级法庭还允许被告

答辩，作了判决还允许上诉，怎么社会科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中就只许批评不许反批评呢？”在学术界正当的论战中，双方都应当被允许采用同样的方式进行批评与反批评。

在贯彻“双百”方针中，还有一个正确对待在社会科学探索中的失误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学术理论与理论宣传不一样，理论宣传是已有理论成果的阐释和宏扬，理论研究则是从已知求未知，是要对一些尚未被认识的领域进行探索。既然是探索，就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理解上的不同，难免会出现失误，会有风险。因为科学不是先验性的结论，而是不断进行科学实验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失败、不断前进的过程。在探索过程中没有失误与失败，一次达到真理的巅峰是不可能的。探索中的失败与失误，是走向真理的必然阶梯。因此，对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需要加以保护，不能随意指责和鞭挞，应当帮助探索者对失误进行分析，找出失误的原因，继续探索并找出事物的内在规律，从而摘取科学探索成功的桂冠。如果不允许在探索中犯错误和改正错误，就等于不允许探索，这不是贯彻“双百”方针应有的态度。在科学文化领域，如果没有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就无法发展。

（三）加强党对学术理论工作的领导

学术理论工作，是我们党在思想战线和意识形态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一向十分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关系思想导向、民族精神和社会风尚，这方面的工作作不好会危及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江泽民同志今年2月23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同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专家、学者座谈时的讲话中特别

强调指出：“社会科学研究的正确与否，社会科学状况如何，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的道德风尚，对经济建设，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的命运。”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而人的思想上的混乱，也常常是从理论上的混乱引起的。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需要加强理论探索并提供理论依据。

——加强党对学术理论工作的领导，首要之点莫过于正确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如上所述，这个方针是党和国家繁荣文化的基本方针，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调动广大学术理论工作者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金钥匙。加强党的领导，就要正确掌握科学发展的规律，运用正确的政策和科学的方法领导学术理论工作，鼓励在这一领域工作的知识分子，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研究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现实问题，研究国际间的风云变换和介绍国外先进的东西，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努力创造勇于探索 and 创新的活跃气氛。同时，要时刻关心学术理论界的工作状况，引导他们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方向发展。反对那种用行政手段干涉学术研究，粗暴责令他们只能研究这样，不研究那样。在正常的学术争鸣中，领导者不要支持一种观点，压制另一种观点，更不要用政治斗争的方法去解决学术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常常出现“杀鸡敬猴”效应，杀了一二只鸡，吓得一群猴子不敢畅所欲言了。学术理论界的空气就是这样沉默下来的。这种事情今后再也不能重复了。

——加强党对学术理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进领导艺术和领导方法。各级领导干部

要善于进行思想领导，要以推心置腹、坦诚相见的态度同学术理论界的知识分子交朋友。要经常倾听学术理论界的意见、建议和呼声，诚恳接受他们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批评、监督。同时，要经常向学术理论界的知识分子介绍政治、经济形势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解决各种思想认识问题。在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干部，要及时了解知识分子的心态，努力掌握知识分子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以创造性的工作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在学术理论界要创造一个宽松探讨问题的环境，创造一个团结、和谐、信任、谅解的气氛，领导者同学术理论工作者要平等交换意见，平等探讨问题，共同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党的领导工作者，还要带头倡导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真理是无法垄断的。探索真理，发现真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大家共同的任务，谁在这方面做得好，就应该鼓励他、支持他，以倡导一种认真探索问题的风气。

——正确引导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是加强党对学术理论工作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已不成其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它仍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着，在一定条件下它还有可能激化，成为全局性的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这种斗争，显得更加明显和突出。一方面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会给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极大的干扰和破坏；另一方面，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渗透、颠覆、“和平演变”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在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武装干涉和颠覆不能达到目的，现在主要采取和平演变战略，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新的世界战争”。他们加紧意识形态的

渗透，开动各种宣传机器，传播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煽动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不满和敌对情绪。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是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的结果，同时又为他们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土壤和条件。面对这种形势，迫切需要加强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工作，在意识形态领域抵制和战胜西方资产阶级“和平演变”战略。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者，要组织、领导和引导学术理论研究工作，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回答西方资产阶级的挑战。当前，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澄清三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否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二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何者优越，三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何者先进。只有澄清这些根本性的理论和思想认识问题，才能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同时，我们还要粉碎西方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用以进攻的三个武器，即“民主、自由、人权”。我们要组织学术研究工作者，以其科学的研究成果，鲜明地论证和阐述无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立场和观点，驳斥西方资产阶级鼓吹的“民主、自由、人权”的虚伪性和反动本质。

——加强党对学术理论工作的领导，还包括对学术研究工作的各种支持和帮助。党的领导部门和各级领导者，要动员全社会尊重科学、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为学术研究工作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提供良好的工作、学习、探讨真理的条件，提供各种信息服务，并为他们提供论证和咨询服务的场所，充分发挥他们的知识优势和智囊群体的作用。同时，为学术理论研究者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创造条件，提供方便，积极采用学术研究者的建议和方案。

（1991年7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

·谢三友·

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在当今国际共运暂时处于低潮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似乎显得很时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就有必要弄清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科学社会主义又称科学共产主义。它是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现代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一门独立的科学。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它从整体上全面研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以及从不发达、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发达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直至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客观规律。它既包括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思想革命的相互作用及其发展规律，又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的相互作用及其发展规律。过去，社会主义革命离不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今天，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同样也离不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

民主社会主义起源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由法国的民主共和党与社会主义党合并即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民主党。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逐步分裂成为左、中、右三个派别。其中，以伯恩斯坦为首的右翼，大搞修正主义，把社会民主主义混同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把社会民主主义改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是一种标榜社会主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潮。他们打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号，对抗科学社会主义，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质上是全盘否认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资本主义道路。

不难看出，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有着根本区别。其一，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以一元论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规律的科学。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指出了无产阶级担负着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阐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对整个社会进行革命改造，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和剥削，最终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民主社会主义则是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它公开提倡“阶级调和论”，认为由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资对立已经消失。因此，他们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对抗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主张通过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执政以后，

实行阶级合作，把劳资双方看成是争取社会进步的伙伴，而抹煞其对立的一面。阶级合作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并没有消除阶级对立和消灭阶级。它的另一个法宝是主张政治“多元论”，认为世界是由许多本源构成的，社会存在是多元的，反映社会存在的政治理论思想也应该是多元的。一个政党不应以一种思想为指导，应以多种思想为指导，政治上应实行多党制。他们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更反对以列宁主义为指导。同时，民主社会主义的倡导者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在向社会主义发展，殊途同归。

其二，实现目标的手段和道路不同。科学社会主义主张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为手段，但不排斥在可能的条件下通过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权。因为科学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国家政权本质上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工具，对敌对阶级来说是暴力机器而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作为统治阶级来说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总之，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运用政权的力量，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而民主社会主义则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他们主张通过民主道路，用改良办法不断从内部“侵蚀”资本主义，发展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民主，削弱垄断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及国际资产阶级的权力，而不要根本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民主社会主义鼓吹的一套改良主义的办法，虽然在某些方面维护了劳动者的眼前利益，但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依然存在。有的社民党已累计执政近半个世纪，但这些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

其三，建设新社会的纲领不同。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在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建设繁荣、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民主社会主义则主张保留私有制。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是衡量一个社会性质的根本标志。而民主社会主义则认为实现社会主义不需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只需要改变它的分配制度就可以。因此，他们主张在保留私有制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国家化和合作经济，实行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混合经济；强调私有制在社会经济中应起主导作用。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认为，要铲除剥削和压迫，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逐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本质特征。因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离开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来谈论社会主义，只能是挂羊头卖狗肉，以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

其四，党的性质和作用不同。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反对派别自由的党，是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领导力量。而社会民主党（或民主社会党）却是反对民主集中制、主张派别自由的“改良党”、“群众党”，它的任务和作用是在议会中争取多数，成为执政党。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而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它不能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获得彻底的翻身解放，最多只能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允许范围内做一些微不足道的改良。因此，中国

正确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

李兴猛

中国共产党是在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成熟、发展、巩固和壮大起来的。70年来，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一直面临着来自“左”的和右的两个方面的干扰，在同外部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也同自己内部的各种错误倾向进行长期的斗争。曾在长时期中影响全党的“左”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势力，在“‘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错误观念影响下，从建国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党内是“左”的错误倾向盛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左”的错误倾向，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左”的错误作出了历史性的总结和深刻的理论分析，为在改革开放中克服僵化思想，消除“左”的积习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就在我们纠正“左”的错误倾向的同时，又出现了“右比‘左’好”错误观点。在这种错误观点下，右的错误倾向愈演愈烈，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成灾，从70年代末的“西单墙”发展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尽管“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形和所包含的内容不同，但它们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离，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一般来说，“左”的错误超越了客观实际，而右的错误却总是落后于客观实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左”的错误倾向都表现为“急性病”，如民主革命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社会主义时期1958年的“大跃进”；而右的错误倾向则表现为对革命和建设的前途悲观失望，如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目前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无论“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具体情形及所包含的内容怎样，从理论上讲，都是违背马列主义的，都是违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

实践表明，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倾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它们造成的后果都是相同的——使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受巨大损失。在民主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导致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惨重失败，党员由6万多人减少到约1万人，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3万

决不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此，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反对民主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作者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党建教研室）

多人,党被迫转入地下,与群众的联系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革命事业损失惨重,由高潮跌落到低潮。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使全党经过千辛万苦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损失了约90%。红军由30多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共产党员由30万人锐减到4万,使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到了惨重的损失,使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在社会主义时期,1958年的“大跃进”使国民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的“左”倾错误,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1989年发展到高峰的以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为标志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使我们党和国家经历了建国以来最严峻的血与火的考验。可见,在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国内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世界上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加上国外敌对势力加紧执行“和平演变”战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潮,它们必然会波及到党内,必然产生“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这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纵观70年来党的历史,“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同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相联系的。以往发生长时间的“左”倾错误,主要是因为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建国后又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孤立、封锁、包围乃至武装干涉的威胁,因而,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时,不适时宜地沿袭了旧的经验和做法,夸大了阶级斗争,“左”的错误倾向就滋生和发展起来。当我们经过艰难的历程纠正了“左”倾错误之后,党和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理所当然地对“左”的干扰保持着高度警惕,加上国外敌对势力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

略,而这也正是右的错误倾向容易被掩盖被忽视的时候。党的历史表明,民主革命时期,“在我们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们党和国民党分裂的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①社会主义时期,当我们在纠正“左”的错误倾向并与国际资产阶级扩大交往的时候,要注意防止右的偏向;当我们在反对右的错误倾向时,如果忽视了“左”的干扰,“左”的错误倾向就会滋生和蔓延起来。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10月总结反对错误倾向斗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十七年来,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斗争的武器,从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②使得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了一致。因此,“我们党已经从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了。”^③面对长期存在的来自“左”的和右的两个方面的干扰和破坏,正确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坚持在既反“左”又反右的两条战线上作战,仍将是我们党今后长期面临的重要问题,这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怎样才能正确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基本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一是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富国之路。这两个基本点是有机的、缺一不可的。要正确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就必须坚持这两个基本点,偏离了这两个基本点,就要犯“左”的或右的错误。无论是“左”的错误倾向还是右的错误倾向,都是违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据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论述,我们正确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基本

原则是：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在反“左”的时候要防右，在反右的时候要防“左”，不能让一种错误倾向掩盖另一种错误倾向。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党的正确路线才能得到全面准确的贯彻执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才能顺利发展。

一、要正确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必须切实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现在，我们党和国家正处在十分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面临着国外敌对势力的各种挑战，经受着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要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贯穿于党的事业的各个方面，是其他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和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往往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包括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④并号召全党要“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⑤充分说明了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在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要正确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必须对当时的形势进行客观的、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抓住错误倾向的实质，确定反对错误倾向的范围和重点，做到有的放矢，正确地开展好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反之，就会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文化大革命”由于分析形势错了，认为在党内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在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其代理人。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只有象过去那样把全体人民动员起来，进行一场触及

全社会每个角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果使“左”的错误倾向发展到了极端，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空前的巨大灾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尽管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就敏锐地指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危害性，并反复告诫全党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原因在于党内一些领导干部，对形势缺乏正确的分析，看不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危害性，这就使得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得不到坚决有力的抵制和批判，反而继续蔓延和泛滥，一直发展到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因此，只有正确分析形势，认清错误倾向的实质和危害性，才能正确地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

三、要正确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必须对错误倾向作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这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正确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中的最基本的要求。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在反“左”的时候，把什么都扣上“左”的帽子；在反右的时候，把什么都贴上右的标签；甚至把正确的当成错误的来反对，结果是越反越错。对于一定时期出现的重大思想动向和社会思潮，我们应当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冷静地客观地加以分析，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判断，问题发生在什么领域和范围，就在什么领域和范围内解决，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按什么性质的问题来解决，而不能主观地随意扩大或缩小，更不能“一刀切”。对于“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即使是已经看准了的，也应作具体分析，切不可主观随意，无限上纲，或轻描淡写，敷衍了事，一定要制定明确的政策界限，并认真执行。

四、在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我们应正确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有领导、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要防止用“左”的方法